

论交流叙述学的研究谱系^{*}

王委艳

摘要: 叙述和交流是人类建构经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以叙述的方式交流是存在于人类各种活动领域中的常见现象,但在叙述学的研究历史中,对叙述交流的研究并不充分。经典叙述学强调文本内部研究,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一直处于暗流状态。后经典叙述学将叙述学研究引入文化领域,用理论介入模式,在叙述学研究中渗透各种理论思想,其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基本延续雅柯布森“语言交际图示”和围绕查特曼“叙述—交流情景示意图”展开。叙述转向开启了叙述学研究新视野,探讨叙述一般特性而非某一种叙述类型的特性,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叙述扩容、对叙述的重新界定,都是开启这一研究范式的表现。叙述在各种学科、领域的表现使其交流性凸显,建构交流叙述学成为一般叙述研究范式下的一项紧迫任务。

关键词: 叙述转向,一般叙述研究,交流叙述学,研究谱系,研究范式

On the Research Genealogy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Wang Weiyang

Abstract: Nar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the basic ways that human beings construct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by narration is common in various fields of human activity, but research into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is insufficient. Classical narratology

^{*}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交流叙述学”(19FZWB049)阶段性成果;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emphasised the internal study of texts, and the study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was never more than an undercurrent.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introduced the study of narratology into the field of culture, using the model of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to infiltrate various theories with the study of narratology. Currently, the study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is basically a continuation of Jakobson's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diagram" and Chatman'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cenario diagram". The narrative turn has opened a new field of vision in narratology research. The new paradigm is to explor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narrative rather th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narrative type. Narrative expansion and a redefinition of narrative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new paradigm. The performance of narration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fields makes its communication promin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becomes an urgent task under the general narrative research paradigm.

Keywords: narrative turn, general narrative research,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research genealogy, research paradigm

DOI:10.13760/b.cnki.sam.202001014

叙述的交流性一直是叙述学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但一直未能充分研究。经典叙述学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发表于《交流》(*Communication*)杂志1966年第8期。罗兰·巴尔特在其发表在《交流》杂志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论》中不但表明叙述的普遍性，即叙述存在于各种领域，而且同时指出叙述交流性研究的不足。俄国形式主义雅柯布森提出其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西摩·查特曼以此为基础，提出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这些理论架构随后经由诸多学者演绎，并直接影响后经典叙述学下的修辞叙述学研究，如詹姆斯·费伦的“双渠道交流”。当今发生在许多领域的叙述转向，使叙述的交流性凸显，在一般叙述的研究框架下，建构交流叙述学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交流性：经典叙述学暗流

叙述的交流性一直是叙述学关注的对象，但经典叙述学对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强调使这种关注一直作为一种暗流而存在。后经典叙述学打破文本框范，

将多种理论、多种视野融入叙述学研究，使叙述学以美国为中心出现复兴局面，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叙述学转向，叙述学研究向历史、教育、医疗、新闻、法律、影视、广告、网络等多个领域扩展，在历经经典与后经典阶段之后，开始酝酿第三次范式革命，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述学研究适逢其时。交流性成为叙述的核心特性，对于交流叙述的研究因而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要建构“交流叙述学”学科，就有必要对交流叙述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建构交流叙述理论的研究谱系。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1925)一文中指出了文学过程的两个重要时刻——选择主题和设计主题，其中心问题则是文学作品的交流性：“主题的选择密切取决于主题在读者中得到的反应。……读者形象即使是抽象的，即使它要求作者尽力使自己成为作品的读者，这种形象也始终出现在作家的意识里”；而“对技巧的关注是作家和他最亲近的读者习以为常的事”。(1989, pp. 234-235)也就是说，对主题的选择与设计均围绕获得最佳交流效果展开。但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交流性的理论，文本形式仍是其研究核心。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理论家雅柯布森在《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并这样解释：

说话者 (addresser) 把一段话 (message) 传送给受话者 (addressee)。想要使交际运行起来，这段话还需要有一个所指的语境 (context)，该语境可以为受话者所把握，它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可以语言化的；需要有一套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或者换言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是部分共有的代码 (code)；最后，还需要有接触 (contact)，接触是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一条物理通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双方能够进入并且保持交际状态。(2001, pp. 52-53)

雅柯布森对于语言交流的影响因素与交流渠道的揭示影响深远。以叙述的方式交流是人类积累和传承经验的重要方式，对纵向的历史层面和横向的共时层面的叙述交流，雅柯布森的语言交际图示均会提供很好的参照。巴赫金则不同，其“对话”“狂欢”理论下的交流基于参与各方的自由、平等，其“复调”理论意为多声部共进，平等观念是其交流对话的核心思想。(2009, p. 4)

经典叙述学受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以叙述文本的话语和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一直是其中的一股暗流。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指出了叙述作品的多样性，而且同时指出了叙述

作品的交流性：“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关键：有一个叙事作品的授者，有一个叙事作品的受者。大家知道，在语言交际中，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同样，没有叙述者和没有听众（或读者）也就不可能有叙事作品。”巴尔特同时指出了叙事作品交流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一点也许很简单，但是研究得还很差。”“问题不在于探究叙述者的动机，也不在于探究叙述对读者产生的影响，而在于描写叙事作品本身过程中叙述者和读者得以获取意义的代码。”（巴特，1989，p. 28）回顾叙述学研究，可以发现，在经典与后经典叙述学之后，在叙述转向的背景下，叙述的交流性已经成为很多叙述类型的普遍特性，但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雅柯布森语言交际图示的演绎上，进展缓慢。

普林斯作为从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过渡的理论家，在其著作《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一书中扩展了叙述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在该书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探讨了叙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他在对阅读的定义中指出，阅读以“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为前提”，阅读一部文本就是提出“关于文本的问题并在文本基础上回答它们”（2013，pp. 102-103）。在本书中，普林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对于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比如在第一章《叙述》中的“叙述者”部分提出“‘我’信号”；在“受述者”部分提出“‘你’信号”；在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提出“最大阅读”“最小阅读”“元叙事信号”；等等。这些概念对于交流叙述中交流因子的辨识与交流语言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后经典叙述学：单向交流叙述图示

后经典叙述学的产生是叙述学研究中的一次范式革命。正如弗卢德尼克指出的：“叙事学的青春年华过去之后，是叙事理论的新定位与分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回应后结构主义的亚学科，学术范式转向文化研究。”（2007，p. 23）后经典叙述学并非经典叙述学中时间意义上的继承，因为在叙述学诞生时，一些突破经典叙述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思想就已经孕育其中，如巴爾特的理论及其对电影、摄影、时装等的研究，就已经突破经典叙述学的研究范围和范式而在符号学意义上具有某种普遍价值。同时，在经典叙述学研究兴盛之时，韦恩·布斯的小說修辞理论无疑具有独特意义，并因此被尊奉为后经典叙述学之修辞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修辞叙述学研究正一步步走向叙述的交流特性，当叙述研究向更广范围的叙述性敞开大门时，

修辞的单向意向性就被交流的双向影响所取代。“在叙述学框架内，叙述被构想为一种交流程序，其中故事层面的信息被一个特定的叙述者传递给一个特定的叙述接受者。”(Herman, 2009, pp. 64—65) 虽然叙述学(经典和后经典)不排斥叙述的交流性，但这种交流性基本还是在文本的框架内存在，所谓“在叙述学框架内”，即是此意。

在交流叙述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查特曼著名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图1)。(查特曼, 2013, p.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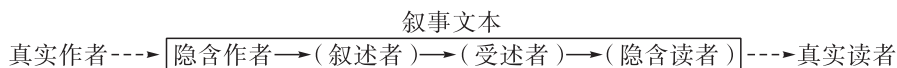


图1 查特曼“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

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被后来的许多国内外的研究者演绎。这种叙述交流模型在经典、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中一直存在，正如赫尔曼指出：“叙述交流模型同时根植于结构主义叙述学(查特曼、热奈特、普林斯)和几乎同时将修辞方法运用于叙述学的先驱——韦恩·布斯。”(Herman, 2009, p. 64) 由此可见，叙述交流模型从根本上讲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将叙述交流框范于文本范围之内，这里存在两种交流方式：一者表现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交流，一者表现为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前者的交流基本上是一种虚拟状态的交流，后者包括两种情况：(1) 非虚拟交流：戏剧化叙述者与其他人物之间的交流；(2) 虚拟交流：非戏剧化叙述者与虚拟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其二是修辞性交流，以布斯和费伦的理论为代表。布斯使用隐含作者、作者的“第二自我”等概念，实际上是想对作者进行文本化、虚拟化处理，以解决作者与文本隔断的问题。费伦则强调：“‘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个说法不仅仅意味着叙事使用修辞，或具有一个修辞维度。相反，它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首先是叙述者向他的读者讲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叙述者的讲述。”(2002, p. 14)

对于修辞性的强调其实遮蔽了另一种事实，即修辞的反作用，即当人们修辞地进行语言活动的时候，其修辞行为也受到来自修辞的反向支配，即修辞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来自语境压力、体裁压力、接受压力，等等，也就是说，修辞主体的修辞行为是不自由的。写作的“单行道”给人一种印象，即作者如上帝一样君临一切，这种文学叙述的“单行道”写作模式使交流叙述模型存在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在叙述转向背景下，这种基于文学叙述的

交流模型必然受到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查特曼的图示根本上是修辞性的，单向性明显，读者（包括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处于交流的末端，作者（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具有交流的先天优势，其权威决定了交流只能从作者单向流向读者，很难再从读者回到作者。因此，这里的交流只是一种修辞行为。詹姆斯·费伦注意到了查特曼交流图示的单向缺陷，他把人物引入叙事交流，从而获得双渠道交流：（1）作者—叙述者—读者；（2）作者—人物—读者。费伦指出，这两种渠道将会相互作用，这样，交流总量要比查特曼的单渠道大得多。（2012）

修辞叙事学研究从布斯开始，经由查特曼、卡恩斯、费伦发展，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关注文学叙事作品之外的叙述作品，比如电影（查特曼）；关注语境、规约和言语行为（卡恩斯）（Kearns, 1999）；关注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之间循环往复的关系（费伦）。修辞叙述学研究对交流叙述研究更具启发意义，而且更加接近交流叙述学。笔者在2013年11月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上提出建构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构想，并对查特曼“叙事—交流情景”的单向性提出质疑。谭君强教授提示笔者，费伦曾经在上次叙事学会议（长沙，2011年10月）上指出这种缺陷（会议论文《修辞、伦理即叙述交流：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资源与读者》），并提出叙事交流的双渠道。但费伦的双渠道交流中，每种渠道依然是单向性流动。渠道与方向是两个不同概念，双渠道并非意味着交流可以从读者向作者回溯，其影响基本是一种单向性的，依然难以揭示叙述经验的积累过程以及这些经验对于叙事交流的意义。同时，这种单向性（或者双渠道）很难放置于叙述的历史层面，去揭示叙述作品由简单走向复杂的动态历史过程。

其实，费伦、查特曼的单向交流源于修辞学的理论根基。修辞学提供的是—种经验贯彻模型，即来自创作主体的经验如何通过符号文本在接受者那里获得贯彻，并且，作者希望获得—种—无—误—贯—彻，因而忽略了接受者的能动性。费伦的双渠道交流只不过为这种贯彻提供了—种—更—多—的—方—式，并没有从—本—上—改—变—交—流—的—单—向—性。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单向交流的缺陷，谭君强指出：

无论是查特曼的模式也好，还是雅恩的模式也好，都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它们都属于单向传动模式，费伦也注意到查特曼的模式是假设了“—个—单—一—的—交—流—渠—道”（a singl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但他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笔者认为，交流不是—个—单—一—传—导—的—过—程，而是—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叙事文本内外的交

流过程同样如此。此外,这种交流并不限于两两相对的诸如真实作者/真实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人物之间的交流,而是各个不同成分之间可以双向甚或多向交叉的交流。(谭君强,2012,p.176)

谭君强明确指出叙事文本的双向、多向交叉交流特性,可惜谭先生并没有以此为起点,建构叙述参与各方之间的交流机制以及这种交流机制的运行特征,也没有站在叙述转向背景下看到叙述性蔓延使叙述的交流性越发突出并走向叙述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叙述交流图示进行演绎,如亢淑平对叙事交流图的改进(亢淑平,2010),刘江对自传叙述交流图的推演(刘江,2012),等等。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止步于对叙述交流图的改进,没有更进一步挖掘交流的内在机制,建构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模型。

事实上,交流叙述图示一直作为修辞叙述学的核心理论思想被演绎,这种所谓的交流其实是一种修辞,是叙述主体为达到叙述目的而传达其思想的流动链条。但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并不自由,他受到来自接受者的反向压力,同时还受到文化、语境、体裁等规约性因素的支配。修辞叙述学隔断了来自接受者反向交流的影响,忽略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中间地带。这其实体现了叙述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两种观点——修辞观和认知观,“修辞学派认为它是作者劝说读者的一种技巧;认知学派认为它是读者解决文本歧义和矛盾的一种阐释策略,与读者的认知框架有关”(倪爱珍,2018,p.159)。但两种认识均没有解决交流的内在机制问题。交流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正是要把这一中间地带的运行机制搞清楚,以便建立一种圆形的叙述交流模型。

因此,建构交流叙述学,必须克服上述修辞性影响,从理论上建构一般叙述学研究背景下的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框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学者已经走到了前面,迪迪埃·科斯特(Didier Coste)在其著作《作为交流的叙述》中指出:“叙述学欲在行动上获取交流,但它仅能够在如下被报道的每一阶段获取交流,即前文本、文本、解释、同文本……上下文、注释、评论、答案和其审问等等。”(Coste,1989,p.6)

也就是说,携带交流性的叙述因子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些因子会在交流的任何阶段、任何层面,甚至任何时间起作用。叙述学和交流的结合开启了交流叙述学研究的大门。

三、后经典叙述学之后:走向交流叙述学

后经典叙述学之后,有一个少有人注意的理论过渡,也就是说,一种新

的叙述学研究范式正悄然在被认为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中酝酿生成。“80年代的叙述转向,使得叙述突破了小说的阈限,进入了不同媒介。传统以小说为原型的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叙述理论的发展”(方小莉,2017,p.100),这不同于经典叙述学囿于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也不同于后经典叙述学的“叙述学+”模式(叙述学+某种理论范式),而是在更广的背景上,重新认识叙述本身,并在多种叙述类型中寻找“叙述”的共相。同时,对叙述文本的建构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承方式进行重新审视,使对叙述的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获得更新。

罗兰·巴尔特在《叙述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有一段被反复引述的话,其中列举了很多类型的叙述。但经典叙述学研究并没有以这个存在于各种领域的叙述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学为中心建构叙述学的理论话语。这给人一种印象:叙述学等同于文学叙述学。但叙述学从来没有囿于文学而限制叙述学的理论拓展力。西摩·查特曼1975年出版《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将叙述学研究视野扩展到电影。查特曼指出,“除体裁区别的分析以外,还有对于‘叙事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界定。文学批评家们太过倾向于单独地考虑文字媒介,尽管他们每天都通过电影、滑稽连环画、绘画、雕塑、舞剧与音乐来消费故事”(2013,p.1)。由此可见,查特曼对叙述的理解是很宽泛的。文学之外的叙述一直是叙述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来没有远离叙述学研究视野。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后经典叙述学阶段,对文学叙述之外的叙述的关注更成为叙述学研究拓展的重要方向。雅各布·卢特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 (2000)探讨了电影的叙述规律。2004年,由米克·巴尔主编的《叙述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2004)涉及很多领域,如法律、历史、社会等。2005年,费伦等主编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2005)代表了21世纪以来叙述学研究的新发展。该书第四部分《超越文学叙事》,专门对文学叙述以外的叙述类型,如法律、电影、歌剧、音乐、历史等,进行学理探讨。2006年,玛丽-劳尔·瑞安出版《故事的变身》(*Avatars of Story*),该书分上下两编,分别探讨了新旧媒介的叙述,尤其是下编,视野对准网络时代的叙述,拓展了传统叙事研究的锋面。尤其可贵的是,瑞安试图拓展对叙述的传统观念,列举了11对叙事模式,对于叙述本体的理解更加宽泛和全面。2009年,桑德拉·埃南(Sandra Heinen)和罗伊·

萨默 (Roy Sommer) 主编的《跨学科时代的叙述学研究》(*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 汇集了 16 位叙述学学者的研究文章, 探讨了叙述学研究在跨学科时代的各种表现。

查特曼直接指出, “叙事是一种交流, 因此它预设了两个参与者——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受者” (2013, p. 14)。查特曼前瞻性地提出“叙事—交流情境”示意图, 但这种交流链条往往被人解读为一种作者意图诉诸文本并影响真实读者的修辞路线。但查特曼的示意图在真实作者与叙述文本之间、真实读者与叙述文本之间用的是虚线, 这意味着, 查特曼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认为真实作者意图会通过叙述文本准确抵达真实读者。而在叙述文本内部, 情况会不同, “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这个链条指示的是一种确定的关系, 因此用的是实线。查特曼的前瞻性还表现在注意到接受者的能动性, 比如对于叙述文本中的人物, 他不认为是一个确定的形象, “人物是由受众根据显示或隐含在原始结构中的、由不管什么媒介的话语传达的迹象重构出来的” (2013, p. 104)。这与费伦坚持的双渠道之一的“作者—人物—读者”交流渠道具有根本不同, 因为后者依然坚持作者修辞的有效性, 其传达可以通过叙述者与人物双渠道进行。叙述文本并非一个完备的世界, “叙事唤起一个世界, 由于它仅仅是一种召唤,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用我们所获得的任何真实或想象的经验去丰富它。不过我们知道何时应该停止推测” (查特曼, 2013, p. 104)。查特曼的观点意味着叙述文本并非一个稳固的结构, 而是一种召唤结构, 接受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丰富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双向交流思想, 这种思想由于其叙事—交流情境而一遍遍被误读或者不完全解读。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指出, “首先, ‘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个说法不仅仅意味着是故事, 而且是行动, 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 (2002, p. 14)。也就是说, 某人在向别人讲述故事的同时, 也在实施一种行动, 这种行动会通过故事的一系列修辞在对方身上达到某种目的。费伦的修辞叙事可表述成如下链条: 叙述者意向—故事修辞—接受者反应。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向交流, 没有考虑到接受者的反向叙述能力, 或者说接受者文本的建构能力。事实上, 这种“叙述者意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修辞, 其目标实现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即接受者能够完全按照叙述者的意向完成对叙述文本的理解, 并按照既定的方式做出反应。虽然费伦在其后的研究中对这种单向交流进行了修正, 提出双渠道交流, 即“作者—叙述者—读者”和“作者—人物—读者” (2013, p. 28), 但这种双渠道依然是一

种单向修辞，只不过多了一条渠道而已，并没有把接受者对叙述的反向交流及其影响考虑进来，本质上依然是修辞性的。

卢特在《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叙事交流。卢特基本上也是在“叙述者—叙述文本—接受者”的单向思维链条中讨论问题，虽然也看到叙述主体会发生翻转，但难以看到经由二次叙述化之后的“接受者文本”即“二度文本化”后的文本与作者文本的区别，因为组成作者文本与接受者文本的材料并不一样。由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叙述文本形式（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距离、反讽、叙述角度、叙述层次、声音、人物、引语形式）等组成的作者叙述文本在抵达读者的过程中会产生增殖，诸如伴随文本、读者的个人状况等都会影响叙述交流：“虽则叙事理论仍以文本为中心，它目前却更加强调、也更感兴趣于叙事交流模式的外部环节：即作为作者的信息发送者和作为读者的信息接收者。由于二者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是一个或更多的文化圈的一部分，晚近文学理论朝向历史和语境转向，并没有降低叙事理论的适切性。”（卢特，2011，p. 16）这里卢特一方面承认作者与读者的不同，另一方面承认叙事理论在二者交流关系中的适切性。卢特对叙述交流的讨论主要围绕文本形式在交流中的作用，或者说这些形式如何影响了接受者的意义判断，“文本意义产生于文本呈现的模范读者与真实读者间的性情和兴趣上的能产性矛盾”。这些讨论运用的是一种修辞学思维，着重解释来自作者并作用于文本的形式如何影响或者引导接受者阅读/观看，忽略了接受者的反塑能力。

因此，从布斯、查特曼、费伦，再到卢特，研究基本沿着修辞学思路进行。尽管查特曼预见到接受者的反向交流能力，但他并没有对此展开研究，而是聚焦于“故事内功能”，“从故事内来说，在一个框架故事中，他为叙述者担当听众，在这个听众身上，各种各样的叙事修辞技巧得以实践”（2013，p. 224）。这仍然属于修辞学思路，用查特曼自己的话说，“尽管理论常求助于逻辑学，但它也严重地依赖于修辞学”（2013，p. 251）。

修辞学虽然也强调修辞链条的完整性，即“作者—文本—接受者”链条的完整，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单向性遮蔽了来自接受者的能动性，同时对文本持固化观，即过分强调文本的固有形态，而没有考虑到在交流中文本的动态建构过程和二度文本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交流叙述理论的发展。

瑞安在《故事的变身》中用第五章专门讨论新媒介时代“走向互动叙述学”，“倘若说经典叙事学未能通过互动文本性的检验，那么并非意味着互动文本性也未能通过叙事性的检验。相反，这意味着叙述学必须扩展原有的领

地”(2014, p. 96); 并指出“互动叙述学的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文学’超文本小说, 而且还包括基于文本历险游戏、互动戏剧、某些单用户电子游戏、多用户网络角色扮演游戏”(2014, p. 94)。这里, 瑞安抓住了在后经典叙述学之后, 叙述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即“叙事性蔓延”, 尤其是进入传媒时代, 网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互动”构成了网络的基本特性。

瑞安的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抓住了叙事性这个根本问题, 同时抓住了网络时代的互动特性, 指出建构“互动叙述学”的必要性。虽然瑞安敏锐地发现网络时代叙述学研究必须拓展范围, 且指出互动性是网络时代的主要特性。但应当指出, 无论互动还是交流, 从来都是人类叙述的核心特性, 也只有交流性, 才使得人类建构了涵盖多学科领域的叙述性经验基础, 这些共享的经验靠交流获得合法性, 同时也靠交流获得经验的累积、更新与散布。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最简叙述定义, 并指出了叙述隐含的两个叙述化过程: 其一是叙述者将有人格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 其二是该文本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2013, p. 7) 笔者在这里有必要提醒, 这两个叙述化过程是相互支撑和相互建构的, 即一个文本只有经过了这两个过程, 才能成为叙述文本, 缺少任一过程, 叙述文本都不能成立。这实际上是说, 叙述文本是双向建构的, 这种双向性就是“双循环交流”。叙述文本作为一种符号构筑, 其意义永远需要在交流中产生并实现。

通过以上的理论梳理,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叙述转向之后, 叙述学的发展正在历经又一次研究范式变革,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头十年, 后经典叙述学有两个研究方向: 其一是新方法介入叙述学研究, 形成“叙述学+”模式; 其二是研究对象溢出文学范畴向多领域、多学科扩展。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后经典叙述学进入所谓第二阶段(以阿尔贝、福鲁德尼克为代表), 多种研究方向间有形成壁垒的危机, 亟须整合, 叙述学研究面临巨大挑战。同时, 发生在各种学科、领域的叙述转向已经形成声势, 叙述自身特性被赋予新理解, 叙述学研究范式发生巨大变革, 这一转变为以叙述为核心, 而非以叙述的某一类型为核心。在经历经典叙述学意欲建构文学叙述的普遍语法这一宏大目标, 和后经典叙述学多元化发展即赫尔曼所谓“复数叙述学”(Narratologies) 之后, 必须重新思考叙述自身的普遍特性及其对于各领域、各学科的意义, 并在多种叙述类型中寻找共相: 一般叙述学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了。

叙述扩容为叙述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种跨学科、跨领域、涵盖所有叙述类型的一般叙述研究正在兴起, 这无疑是叙述学研究的又一次范式转

换，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研究框架，瑞安的跨媒介叙述学研究，理查森等人的非自然叙述研究等，均试图探讨叙述自身的特性，即让叙述回归一般状态。所有这些研究已经开启了一般叙述研究的大门。交流叙述学正是在一般叙述的研究框架下探讨交流叙述的内在机制，并探索建立交流叙述的理论框架。走向交流叙述学，走向叙述学研究的第三阶段，即一般叙述学研究，是叙述学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引用文献：

- 巴赫金（2009）.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载于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巴特，罗兰（1989）.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 载于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查特曼，西摩（2013）. 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方小莉（2017）. “形式”犯框与“伦理”越界.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4.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费伦，詹姆斯（2002）. 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费伦，詹姆斯（2012）. 修辞、伦理即叙述交流：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资源与读者. 外语与外语教学，1，75—80.
- 弗卢德尼克，莫妮卡（2007）. 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 载于 James Phelan & Peter J. Rabinowitz（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亢淑平（2010）. 关于叙事交流示意图的商榷.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3，367—369.
- 刘江（2012）. 自传叙事交流情景与自传身份隐喻. 当代外语研究，1，53—57，& 64.
- 卢特，雅各布（2011）. 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徐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倪爱珍（2018）. 反讽叙述的形成机制：交流主体的距离.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16.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普林斯，杰拉德（2013）.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瑞安，玛丽-劳尔（2014）. 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谭君强（2012）. 再论叙事文本的叙事交流模式.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173—177.
- 托马舍夫斯基（1989）. 主题. 载于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雅柯布森（2001）. 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0)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Herman, D. (2009). *Basic element of narrative*. New Jersey, NJ: Wiley-Blackwell, A John Wiley & Sons, Ltd. Publication.

Coste, D. (1989). *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 Minnesota,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othe, J. (2000).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elan, J. (2000). *Peter J. Rabinowitz,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Ryan, M. R. (2006). *Avatars of story*. Minnesota,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earns, M. (1999). *Rhetorical narratology*. Nebraska,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al, M. (2004). *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

Heinen, S. & Sommer, R. (2009). *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 D-10785. Berlin, GER: Walter de Gruyter.

作者简介:

王委艳, 文学博士,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 研究方向为当代文艺理论、叙述学。

Author:

Wang Weiyang,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Nanhu youth talent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narratology.

Email: wangweiy04@163.com